

谈《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的板刻

苏 兴

《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原来只知道日本内阁文库藏有一部，国内学人似乎只有孙楷第、傅惜华、王古鲁检读过，《西游记》的研究者从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和傅惜华的《内阁文库访书记》略知其面貌。现在由中州书画社就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河南省图书馆新收该书选佳影印出版，无疑是对《西游记》研究领域的新贡献。

兹依照影印本，结合过去国内学者对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的著录，对其板刻谈一点看法。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都记录说内阁文库本的《五行山下定心猿》一图（按第七回下图）中，岩石上有细字四，曰“刘君裕刻”，因此说此本是昌启时刻书也。王古鲁对《二刻拍案惊奇》的介绍（《本书介绍》），则说《五行山下定心猿》图四细字是“君裕刘刻”，今细审影印本的该四字、虽较模糊，也能辨识出乃“君裕刘刻”是。但这一点关系不大，刘君裕为图刻者是肯定的。王古鲁说刘君裕乃昌启时有名刻工，意思与孙楷第同，承认李评《西游记》是昌启时刻的书。关此，我以为刻书时间不妨前后稍稍拉长一点，定为万历末到崇祯的明末为宜。因为刘君裕既在万历四十三年乙卯为姑苏龚绍（少）山梓的《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镌刻过

插图（见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又在崇祯间为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镌刻插图（见傅惜华《中国古典文学版画选集》五四五图及书眉的说明）和崇祯五年镌尚友堂刊本《二刻拍案惊奇》的图（见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三及王古鲁关于二刻的说明）因此，说只有总计八个年头的泰昌、天启年间是产生《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的时间限度，未免过窄，不如上下各拉长一点好。又，孙楷第、王古鲁都没有提到《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还有一名刻工，即郭卓然。《断魔归本合元神》图（第二回下图）右下边山岩上刻有“卓然”二字，其《径回东土》图（第一百回上图）的右下方明显的刻有“旌德郭卓然镌”六个字。郭卓然是何时活跃的刻工呢？《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一九八二年新一版卷一记《宣和遗事》云：“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明本，二卷。九行，行二十字。卷首有图，题‘旌德郭卓然刻’乃璜川吴氏旧藏本。日本长泽规矩也云：“叶敬池本《醒世恒言》记刻工有郭卓然之名，则此明季刊本也。”被认为《醒世恒言》最先刊本叶敬池本，其刊刻年代不会早于可一居士作序的天启七年丁卯。所以，如认为郭卓然镌刻小说插图可能延至崇祯初，则是无疑的。当然，也不排除他在万历末即已镌刻小说的图像。——总之，根据《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两名图像的刻工活动时期推断，说这部书刻于万历末至崇祯初的明末，比说“昌启间”要好些。

这里两名刻工的问题提出一个疑问，未目验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不知是有郭卓然镌刻的记载被孙楷第忽略了昵？还是无有郭卓然的记载？《径回东土》图的“旌德郭卓然镌”六个字特别明显，比《五行山下定心猿》的“君裕刘刻”四个字醒目得多，如有，怎么会逃过孙楷第的双睛？如果内阁文库本无有郭卓然的记载，那么便可以说明末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不是刻过一次，内阁文库本与中国历史博物馆，河南省图书馆的藏本不是

同一个版次。这属于推论，记此，以俟知者。另外，由影印本看，时有版片断裂和印刷模糊之处，可以断言中国历史博物馆或河南省图书馆藏本，必定有一个是后印本。

李评本《西游记》是何地刻印本呢？日本内阁文库本与影印本所据的两个底本，都没有提供线索。但根据一些侧面情况判断，说它“似为苏州刻本”（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总是可以的吧。这且不谈其“题词”作者袁于令是苏州人，评者叶昼是无锡人。以两名刻图工所刻其他作品图像，而那些作品多是刊于苏州，是可以假定它的刻刊地域的。刘君裕刻图像的《春秋列国志传》是姑苏龚少山梓行的；《水浒全传》则是杨定见在吴中与袁无涯相见，袁无涯予以刊刻的；尚友堂的《二刻拍案惊奇》是金閻安少云梓行的。郭卓然刻图像的叶敬池刻本《醒世恒言》，则是“金閻叶敬池梓”。由上大体可以判断为刘君裕、郭卓然两人是苏州的刻工（旌德人郭卓然可以以苏州依托进行职业活动），因而假定《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是苏州的产品当不会错。

谁梓行的？无线索可寻，暂不能说什么。

日本内阁文库本据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和傅惜华《内阁文库访书记》描述，在袁于令题词后尚有“凡例”五条，今影印本无，盖两底本均偶缺所致，据《题辞》残缺，须用宋体字参孙楷第录内阁文库本文加以补入，可知两底本的第一本都是残破的。如果检核内阁文库本的第一百回上图非郭卓然镌刻，如前所述，则又当别论。

作者工作单位：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